

海源阁旧藏校宋本《管子》述考*

巩 曰 国

聊城杨氏海源阁,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,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并称“南瞿北杨”,久负盛名。海源阁藏书,除宋元旧本外,校宋本亦是其一大特色。其中的校宋本《管子》,即为不可多得的善本,郭沫若称其“颇可宝贵”^①。此书今收藏于国家图书馆。

现在能见到的《管子》版本,以宋代杨忱本的翻刻本为最古^②,明刘绩《管子补注》本次之;另有南宋蔡潜道墨宝堂刊本,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撰《管子集校》时已不知去向^③,今无从得见。海源阁旧藏校宋本《管子》,底本为刘绩《管子补注》本,陆貽典以“宋本”通校两遍,黄丕烈又以墨宝堂本覆校前四卷。该校本集杨忱本、刘绩本两种重要版本之异同于一体,又保存了墨宝堂本的部分内容,含有丰富的学术信息。今就目验所及,结合相关资料,对其形成、流传及文献价值略作考述,或有补于《管子》研究及海源阁藏书之研究。

一、校宋本《管子》的形成与流传

校宋本《管子》卷末有陆貽典跋文二则,可考见其底本、校本的来源及校书经过:

毛斧季以善价购得锡山华氏家藏宋刻《管子》,钱遵王贻余此本,竭十日之力,校勘一过,颇多正。时赋役倥偬,愁闷填胸,当研朱点笔时,大似弈秋海弈,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,抚己为之一笑也。康熙五年四月二十有六日,常熟陆貽典识。

古今书籍,宋板不必尽是,时刻不必尽非,然较是非以为常,宋刻之非者居二三,时刻之是者无六七,则宁从其旧也。余校此书,一遵宋本,再勘一过,复多改正。后之览者,其毋以刻舟目之。康熙五年丙午五月七日,敕

* 本文为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“《管子》版本研究”(10YJC870009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郭沫若:《管子集校叙录》,《管子集校》,科学出版社,1956年,第4页。

②杨忱本初刻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,今存者为南宋初年翻刻本,国家图书馆有藏。

③郭沫若:《管子集校叙录》,《管子集校》,第2页。

先再识。

据跋文,陆貽典校《管子》所用底本来自钱曾(遵王),其校本为毛扆(斧季)以善价购得的锡山华氏家藏宋本。将校宋本中陆貽典所校文字与今存国家图书馆之杨忱本翻刻本比照,均相吻合。如卷五《重令》篇“则是教民邪途也”处书眉,陆貽典朱笔楷书校语:“‘也’下宋板脱。”今存翻刻杨忱本“则是教民邪途也”下正脱一页。校宋本卷一第一页书眉陆貽典云:“诸卷首日低三字,二层写。”《牧民》小标题“右国颂”处书眉云:“此等低六字。”此两处格式亦与今存翻刻杨忱本相同。今存翻刻杨忱本《管子》为黄丕烈旧藏,其中卷六自《法法》篇“上好勇则民轻”以下至卷末,包括《法法》篇的一部分及《兵法》全篇原缺,黄丕烈据影抄本补齐^①。查校宋本中,陆貽典于“上好勇则民轻死”处书眉有校语:“自此至卷末宋板脱。”据此可知,陆貽典所用的校本为翻刻杨忱本无疑,且很有可能与今存于国图的黄丕烈旧藏本是同一部书,陆貽典校书时卷六已部分缺失。

根据跋文,陆貽典校《管子》是在康熙五年(1666)四、五月间。先初校,“竭十日之力,校勘一过”,四月二十六日校毕;后再校一过,五月七日结束。查校本各卷后陆貽典所记校书日期,与此相吻合。陆貽典在有的卷末还详记校书时刻,如卷四后记“十八日午刻校,初二日薄暮重校”;卷十九后记“二十五日辰刻雨窗勘,初六日申刻校第二遍”;卷二十二后记“二十五日漏下二鼓校完此卷,初六日灯下再校一过”。由此可见其用力之勤。陆貽典初校用朱笔,再校时用墨笔,以示区别。再校主要是补充初校时漏校之处,如《大匡》篇“将胥有所定也”,翻刻杨忱本“胥”作“聿”,初校漏校,再校时墨笔校改;“其甲与货”,翻刻杨忱本作“其车甲与货”,初校漏校,再校墨笔补“车”字。刘绩本脱漏甚多,有的地方初校仅以朱笔标出脱漏之处,再校时则补齐文字。如《小匡》篇“荆州诸侯莫不来服”,翻刻杨忱本此句下还有“中救晋公,擒狄王,败胡貉,破屠何,而骑寇始服。北伐山戎,制冷支,斩孤竹,而九夷始听。海滨诸侯,莫不来服”41字,陆貽典初校以朱笔标出,再校用墨笔补出此41字。

此校本后来又经黄丕烈以墨宝堂本覆校,时间在嘉庆二年(1797)。卷一后有黄丕烈识语:“嘉庆二年夏五月用残宋本覆校一过。书中注于下方者皆覆校语也。”残宋本即墨宝堂本,因缺第十三至十九卷,故称残宋本。黄丕烈校用墨笔,先于文内以小三角符号标出所校之字,复于页下版框外书写校字,并于

^①黄跋曰:“甲子岁,余友陶蕴辉鬻书于都门,得大宋甲申秋杨忱序本……内有钞补并伪刻之叶,在第六卷中,遍访诸藏书家,无可借钞。时钱塘友人谓余曰:‘嘉兴某家有影宋钞本,与此正同。’余闻之欣然,久而无以应我之求。适陶君往嘉兴,于小肆中获其半,检所缺叶,一一完好,字迹与刻本纤毫不爽,方信影钞者即从余所得本出,而下半部偶失之耳。命工用宋纸从影钞本重摹,辍钞补伪刻之叶而重装之。”见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9年,第83页。

校字之右下方标“宋本”二字,此与陆貽典于原文行间直接出校不同。黄丕烈校第一卷甚为仔细,正文、注文、避讳皆校。如《牧民》篇“地辟举则民留处”下注文:“言地尽辟则人留而安居处也。”黄丕烈校:“‘也’,宋本无。”同篇“敬宗庙”之“敬”、注文“贞廉”之“贞”,《权修》“百姓殷众”之“殷”,宋本因避讳缺笔,黄丕烈均出校。但第二卷后较少出校,第三卷仅《幼官》篇有数条,至第四卷仅《宙合》篇列一条,第五卷起则不再校。

校宋本《管子》入藏海源阁以前,曾为江南藏书家席鉴和顾之逵收藏。席鉴,字玉照,号茱萸山人,江苏常熟人,乾隆间国子监生,家富藏书,王欣夫疑为席启寓(1650-1702)诸孙十人之一。校本中有“席鉴”、“席玉照读书记”、“萸山珍本”等藏书印。顾之逵(1753-1797),字抱冲,元和(今江苏苏州)人,与黄丕烈、周锡瓚、袁廷桢并称乾嘉间四大藏书家,藏书处名小读书堆。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录有嘉庆丁丑(1817)黄丕烈题墨宝堂本之跋文,其中云“余故友小读书堆藏陆敕先校宋本,亦向伊后人借归据补”^①,知此时校宋本《管子》尚在顾之逵后人手中。

校宋本《管子》后来由南入北,归聊城杨氏海源阁。书中“宋存书室”、“杨绍和审定”、“杨绍和读过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彦合鉴藏金石书画印”、“彦合珍藏”等印,均杨氏所钤。《楹书隅录》著录的“校宋本《管子》二十四卷六册”^②,即为此本。民国时期,鲁西地区匪寇频繁,动荡不安。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,将部分珍本运往天津保存。1931年,杨敬夫迫于生计,将海源阁珍本92种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,校宋本《管子》为其中之一。后杨敬夫无力赎回,由潘复、王绍贤、张廷谔等人组织存海学社,筹款赎回,仍储存在天津盐业银行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政府拨专款将此92种珍本收归国有,校宋本《管子》和其他保存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海源阁遗书一起,入存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,即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^③。

二、校宋本《管子》的文献价值

校宋本《管子》的文献价值,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:补《管子集校》之缺漏、校《管子》旧注之脱误、探究墨宝堂本《管子》之面貌。今分述如下:

1. 补《管子集校》之缺漏

《管子》诸版本中,刘绩本和杨忱本属于不同的系统^④,文字差别较大,可以参互校正之处甚多。这两种版本的不同,郭沫若等人的《管子集校》多已举出,但仍有未备之处。校宋本中,陆貽典以翻刻杨忱本校刘绩本两过,甚为详

^①黄丕烈: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,第81页。

^②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(十)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482页。

^③王绍曾、沙嘉孙:《山东藏书家史略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,1992年,第230、231页。

^④参见笔者《〈管子〉版本述略》,《管子学刊》2002年第3期。

密,可补《管子集校》之缺漏。以《大匡》为例,该篇篇幅较长,刘绩本与杨忱本异文较多,《管子集校》已举出 50 条,而陆贻典所校更为详备。笔者统计,陆贻典校出而《管子集校》未出校的尚有 27 处。这 27 处,基本上是刘绩本有误,据杨忱本校正。其中多数是脱文,也有一些误文、衍文与倒文,具体如下:

脱文 16 处:“文姜通于齐”,陆贻典在“齐”下补“侯”字;“齐侯怒,飨”,陆贻典“飨”下补“公”字;“请以彭除之”,陆贻典“彭”下补“生”字;“于徒人费”,陆贻典句前补“反,诛屦”3 字;“战于乾”,陆贻典“乾”下补“时”字;“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”,陆贻典句前补“得”字;“寡人愿生得”,陆贻典“得”下补“之”字;“今彼天下皆乡之”,陆贻典“彼”下补“反齐”2 字;“今若杀”,陆贻典“杀”下补“之”字;“必令忽相之右”,陆贻典“相”下补“齐”字;“君免臣于死,臣之幸也;然臣之不死纠也,臣不敢”,陆贻典“不死纠也”后补“为欲定社稷也。社稷不定,臣禄齐国之政而”21 字;“明年,公怒告管仲,欲伐宋”,陆贻典“管仲”下补“曰”字;“鲍叔谓管仲,国死者众矣”,陆贻典“管仲”下补“曰”字;“桓公缘令以封之”,陆贻典“桓公”下补“筑”字;“弛市之征”,陆贻典“弛”下补“关”字;“乃游公子方于卫”,陆贻典“公子”下补“开”字。

误字 8 处:“祸理属然”,陆贻典校“然”为“焉”;“今既定矣”,陆贻典校“今”为“令”;“夫国之纠也”,陆校“纠”为“乱”;“诸侯兴兵而救宋”,陆校“救”为“伐”;“齐亦毋复侵鲁”,陆校“毋”为“无”;“鲁何不用兵”,陆校“何”为“胡”;“高子识工价之有善者”,陆校“价(價)”为“贾”;“野原及多发”,陆校“及”为“又”。

衍文 2 处:“事之不济也免公其从于鲍叔而言子者为上死者为下”,陆贻典删“其从于鲍叔而言”7 字;“桓公不听,果与之遇,庄工自怀剑,管仲又谏曰”,陆贻典删“果与之遇,庄工自怀剑”9 字。

倒文 1 处:“虽得贤,庸必能之用乎”,陆贻典校“之用”为“用之”。

《管子集校》汇集《管子》宋明版本 17 种,是《管子》校勘整理的集大成著作。但由于是多本合校,某些版本之间的校勘不免有所缺漏。上举《大匡》篇中,陆贻典以翻刻杨忱本校刘绩本,可以补充《管子集校》的就有 27 处,而且其中有些文字差别还相当大。这样的情况,在《管子》其他篇中还有一些,此不备举。这些异文,对《管子》的文本校勘及版本研究,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2. 校《管子》旧注之脱误

《管子》旧注,以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为最早。旧本多题“唐司空房玄龄注”,笔者已详加辨驳,此不赘述^①。尹注在流传过程中,多有脱误,扞格之处甚多。校宋本中,陆贻典除详校正文外,对翻刻杨忱本与刘绩本中尹知章注文的不同之处,也都一一标出。两相比照,很容易发现问题,为校正注文提供了

^①参见笔者《〈管子〉尹知章注二考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04 年第 4 期。

很好的帮助。

有的地方刘绩本有误,可据翻刻杨忱本订正。如:《牧民》篇“故君求之则臣得之”下注文,刘绩本作:“君将求之,臣也先索得之也。”翻刻杨忱本第一个“也”作“已”,“臣已先索得之也”,文义明确顺畅。《形势》篇“小谨者不大立”下注文,刘绩本作:“言人无引量,但有小谨,不能大立也。”翻刻杨忱本“引量”作“弘量”,正合文义。《权修》篇“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”下注文,刘绩本作:“苟功不立名章必为三患。”翻刻杨忱本作:“苟功不立名不章必为三患。”则知刘绩本“名”与“章”之间脱“不”字。

刘绩本可以校正翻刻杨忱本注文的地方也很多。如:《牧民》篇“道民之门,在上之所先”下注文,刘绩本作:“上所先行,人必行之,其从之若由门矣。”翻刻杨忱本作:“上所先行,人必行人必从之若由门矣。”文义不通,可据刘绩本校正。《形势》篇中,“亲近者言无事焉”下注文,刘绩本作:“亲于近者,贵于恩厚,不在于虚言。”翻刻杨忱本无最后“虚言”2字,文义残缺,可据刘绩本补。《权修》篇中,“见其可也,喜之有徵”下注文,刘绩本作:“必有恩锡以验之,见喜无空然矣。”翻刻杨忱本“喜”作“善”,与正文“喜之有徵”不合,可据刘绩本校正。

《管子集校》的《管子》校勘成果,例不校注文。校宋本正文注文并校,为《管子》注文的校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《管子》传世各本,多来自杨忱本或与之关系密切的赵用贤本,其中尹注的不通之处,很少有人注意用刘绩本来校正。校宋本呈现了杨忱本可以校正刘绩本注文之处,也提供了刘绩本可以校正杨忱本注文的信息,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《管子》旧注,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刘绩本版本价值的认识。

3. 探究墨宝堂本《管子》之面貌

墨宝堂本《管子》曾为海源阁旧藏,民国间归日本人控制的大连图书馆,后不知去向。有人称在日本,有人说流入前苏联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尚未有国人得见此珍本。校宋本中,黄丕烈在陆貽典通校的基础上,又以墨宝堂本覆校前四卷,为我们提供了墨宝堂本的宝贵资料。因有陆貽典校在先,所以凡陆貽典据杨忱本出校的地方,墨宝堂本与翻刻杨忱本又无不同,黄丕烈即不再出校。黄丕烈出校的地方,除了陆貽典漏校外,都是墨宝堂本与翻刻杨忱本不同的地方。黄丕烈覆校的部分,以第一卷最为仔细。第一卷正文中翻刻黄丕烈所校共13处,其中有1处属于陆貽典漏校,其他12处呈现出墨宝堂本与翻刻杨忱本的不同,今列举如下:

- (1)《牧民》:“政之宝也”,黄丕烈校“也”作“之”;
- (2)《形势》:“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”,黄校无“也”字;
- (3)《形势》:“不在所宾”,黄校作“不不所宾”;
- (4)《形势》:“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”,黄校“来”作“往”;
- (5)《权修》:“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”,黄校二“杀(殺)”字

均作“弑”；

- (6)《权修》：“班禄赐予”，黄校“予”作“民”；
- (7)《立政》：“城郭险阻不足守也”，黄校无“也”字；
- (8)《立政》：“轻租税薄赋敛不可恃也”，黄校无“也”字；
- (9)《立政》：“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”，黄校“德”作“得”；
- (10)《立政》：“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”，黄校无“也”字；
- (11)《立政》：“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”，黄校“畏”作“威”；
- (12)《立政》：“草木不殖成”，黄校“殖”作“得”。

这些异文，可以作为《管子》文本校勘的重要参考，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墨宝堂本的面貌。检校宋本第一卷中，陆貽典所校翻刻杨忱本与刘绩本正文文字不同之处，不下 50 余条；而据黄丕烈的校勘，卷一墨宝堂本与杨忱本的不同处仅 12 条，而且其中有 5 条（第 1、2、7、8、10 条）仅是句末语气词“也”字的区别，与翻刻杨忱本明显不同的仅有 7 条。这 7 条中，有的音同（第 9、11 条），有的形近（第 5 条），有的反义（第 4 条），有的讹误（第 3 条），仅是个别字的不同，没有衍文、脱文与倒文。这说明墨宝堂本与杨忱本这两种宋本《管子》，在文字上差别不是很大，二者关系较为密切。根据诸家著录资料，墨宝堂本卷一后有“瞿源蔡潜道宅 墨宝堂新雕印”双行牌记，卷末有“瞿源蔡潜道宅板行 绍兴壬申孟春朔题”双行牌记，知其刊刻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。杨忱本初刻于北宋仁宗年间，今存杨忱本为南宋绍兴初年翻刻本^①。墨宝堂本为“新雕印”，且刊刻在杨忱本之后，其底本很可能是杨忱本或与之关系密切的版本，因此与杨忱本在文字上差别不大。

海源阁藏书中，以“四经四史”为代表的宋本，长期为人所关注，而其中的校宋本，则较少有人论及。单从版本上看，校宋本自然比不上宋本珍贵，但校宋本所包含的丰富学术信息，则往往为宋本所不及。校宋本《管子》校勘详备、保存完好，为《管子》文本校勘及早期版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，体现了海源阁藏书的重要学术价值，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院

^①参见笔者《〈管子〉杨忱本刊刻年代考辨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03 年第 3 期。